

中国书院复兴的当代价值

程方平, 王艳芳

摘 要: 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院持续千年并且于多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书院改制之后, 书院之名虽逐渐淡出, 但是作为书院强大生命力的核心元素——书院精神并未因之而消逝, 并且绵延至当代, 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复兴。这不仅仅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文化某些片断和元素的重视, 同时也意味着对于文化的自觉。随着中国教育界对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及价值反思的不断深入, 对书院的价值及其在当代复兴的意义也不可避免地会进行重新思考, 其必要性显而易见。

关键词: 书院制度; 书院复兴; 价值反思

中图分类号: G649.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6)05-0136-06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6.05.014

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院持续了 1 000 余年。千余年间, 书院不仅于教育、藏书、编辑、学术、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而且对思想的发展、文化的传承, 甚至包括社会改革、移风易俗等多方面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时至近代, 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摧毁了满清天朝上国的梦想, 同时削弱的还有国人对于本土传统文化的自信和理想。于是, 随着书院改学堂一声令下, 绵延千年的书院似乎一朝全无是处, 无可奈何地退出历史舞台。诚然, 这一变革本身的意义不言自明。然而, 当完全移植于西方的高等教育系统逐渐出现“重科研却科研不济, 倡自由竟自由不见, 轻人文致人文尽失”的困境的时候, 不少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思考书院的价值, 重新思考当年胡适先生“光绪变政, 把一千多年来书院制度完全推翻, 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 要知我国书院的制度, 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 书院之废, 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 将不复现于今日了……毁了书院来办他们所谓的学堂! 他们不知道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 他们忘了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 研究学问, 代表时代思潮, 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1](P28)}的论断, 开始重新思考那场废书院兴学堂的革命必然会连带的偏颇, 进而开始重新思考“书院复兴”的当代价值。

一、对书院教育的价值判断

中国书院制度的产生, 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制度发展到宋以后, 形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独具特色, 同时也极富生命力的特征。在继承先秦百家争鸣传统、融汇儒佛道三教精华的基础上, 建构了一个代表中华文明博大和开放精神的教育制度, 而且是一种以学生和学术为本的制度。它既吸收了历代官学的长处, 注重学术的规范性, 同时又保留了私学的因材施教和独立研究的创新精

作者简介: 程方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872); 王艳芳,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神,致使在绵延千年学术与教育史中,书院培育的英才无数、成就斐然,在教育教学方面为整个教育和学术界树立了与西方大学本质相同的精神与规范。教育史家张正藩曾这样评论书院:书院“对于我国教育、社会、政治及学术思想等方面的,均有极大之影响。仅就教育而言,如院址之优美,讲学之自由,教训之合一,以及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注重自动自发研究精神等等,若与现代之大学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1](P1)}书院之于后代教育制度的影响,探索频频、处处增彩。下面仅从教学科研和评价管理两方面略及其重要价值和积极影响。

(一) 书院之教学与科研

1. 书院教学之自由开放。书院学术精神的核心是自由讲学、学术争鸣、开放门户、自由出入。书院创造的“讲会”制度即适应自由学术争鸣的典型范式,其本质特点即朱熹所讲的“会友讲学”,“就所讲之书,问难扬榷,有奇共赏,有疑共析”,是大师、师友或师生甚至社会上的求学者会聚在一起,自由讲学、自由争辩,从而提高学术水平的一种教与学的社会活动。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参与争辩,自由阐发其思想,进而能形成浓厚的自由探究与学术论辩的氛围,吸引了众多的求学和探索者。书院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书院教育至为关键的品格之一,体现了书院实践者的学术自信与开放襟怀。书院不但引导学生择师入学,而且欢迎各种背景的人士自由参加讲会活动,不受地域、地位局限。倘有名师硕儒讲学,其他书院的学生和慕名而来的学子都不会被拒之门外。如明代王阳明在稽山书院亲临讲学之时,来自于全国各地如湖南、广东、直隶、南赣等地的听众多达300余人。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时,四方学者“闻风向附,学舍至不能容”^{[3](P242)}。清代顺治年间白鹿洞书院还拨专款接待前来听讲的学子,并规定:“书院聚四方之俊秀,非仅取才于一域。或有远朋,闻风慕道,欲问业此中者,义不可却。”^{[4](P15)}书院的讲会制度、门户开放政策使书院能打破门户之见而博采众家之长,有利于学术交流,扩大了教育范围,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学术空气,提高了教学水平,在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2. 书院之教学科研相结合。最早的书院是官方藏书、校书、编书、印书的场所,从业官员不仅要考订、校勘图书,还要“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辩相邦国之大典”,并承担对求学质疑者“顾问应对”的职责,因而必须要求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传承能力。起初,私人的书院往往会因藏书丰富而吸引诸多的学子前来阅览、问询、讨教,所以,于公于私书院自其诞生之初,就具有较浓厚的学术传统和教学功能。伴随着书院的发展,书院的教学与学术的关系则日益密切。书院的主持人大多为某一学派的大师,在学术方面有精深的造诣,对何为最重要的知识、技能与方法有自己的判断,对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也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在教学时,学者们明示的多是自己的学术研究心得,学习者在增益新知识的同时更多地会学到思考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入院开讲的是《中庸首章》,还有《大学或问》、《白鹿洞讲堂策问》等讲义,并能在教学相长的互动中使其见解逐渐成为传世的经典。曾有学者推定,朱熹的名著《四书集注》,就是在“多年教学实践中采用的教材讲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编辑成为整部著作的”^{[5](P28)}。可见,学者们的研究是以活跃、开放的教育教学互为表里、相互促进的,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探索实验中心,也是独立和纯粹的学术研究殿堂。历史上不少新内容的教学、新方法的实践、新教学或研究理念的传播,都首先源于那些著名的书院,包括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与实学、清代融入西学内容和方法的改良书院等,都是在教育和研究等方面先行探索的重镇,是通过体制外探索进而影响整个体制创新的重要平台。

(二) 书院之学习评价与管理

书院对于学习者(包括青年学子和社会求学者)的评价和管理,更多的或者说更本质的是对其内在的或心性进行管理和评价。书院吸引来者,是有品德和课业要求的,但没有年龄、籍贯、社会地位等各方面的限制,正如朱熹所说:“将以俟四方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而对于学

有所成或有专长的士子，书院会提供食宿以招募其来书院学习交流，且有相关的奖惩措施以激励来者自主学习。

较之官学严苛的入学门槛和惩罚机制，书院虽也用各种规章来施行管理，但多是为了树立一种导向，体现为一种可选择的“约定”，认同者应该遵守“契约”，希望来者可通过自己认同的文化规范来要求自己，本质上是一种心本管理或自主管理。在历史上从许多书院制定的规则、山长们对求学者的大体要求可以窥见这一鲜明的特点。如主讲南岳集贤书院长达九年的文瑞成，尝撰“立德、立功、立言，史是之谓不朽；希贤、希圣、希天，人皆可以为之”的对联与前来者共勉，有形的管理被融入无形的文化认同之中。他教人以“强恕”进而“求放心”，每命生徒“晨起礼圣”、“住香静坐”、“待心归腔”后再读书。常言“读圣贤书，不徒为科名起见，须见得句句是切实教我为人处”^[6](P376)。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管理的强制性能得到较好的调整与改善。

在书院日常管理中，学习者的自主管理也是书院秉持的一个鲜明特色。以清代白鹿洞书院为例，《白鹿洞志》卷十一详细记载了当时书院的管理人员数及客观条件。在这个由15名管理者、7名工作者和4名勤杂人员组成的管理系统中，只有2名管理人员（主洞和副讲）是专职人员担任，4名勤杂人员由临时人员担任，其余20人均选用学生充任。有时学生还参与书院志的编校、院田的清查、田租的征收等工作，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综合能力。可以说，书院的管理还主要是由学生自己参与进行的，不仅大大节约了书院的人力、物力、财力，也锻炼了学生的生存发展能力，提高了办学的效率和水平。

书院之教学与科研一体化的特点创造出书院源源不竭的发展动力，而书院独特而有效的管理机制则为其提供了生生不息的生命源泉，故而，书院在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中，能成为可与官学比肩，甚至超越官学的学术和教育“先进”，其主要的特点与价值不容忽视。即便从现代教育的角度看，作为“非正规”和“体制外”的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模式，书院倡导并实践的学术自由、诸家讲学、开放学习和参与式管理等，至今仍是全世界学术界、教育界追慕的理想，因此其经验和探索不仅不会过时，且体现了中国方式与中国智慧，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极为有益。

反思我国现行的学校教育系统，由于深受西方工业文明和当代全球一体化、标准化的影响，过于依赖和强化统一的规范，不仅使社会“学习”固化于机械化“学校”学习的狭小范围之中，也很难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因材施教，教育教学改革的宏伟设想与僵化的教育模式产生抵牾，试图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学校教育受尽质疑。相比较而言，在中国历史上曾生机勃勃、百花齐放的书院及形态，确有许多文化上、体制上的可借鉴之处。近些年来，一些高校和学术团体的书院探索，也促使更多的人思考：中国的学术及教育系统是不是只能效法和追随西方的做法，在构建全民学习型社会的今天，遍布全国的数百所书院如果能够复兴，恢复其传统的藏书、阅读、教学、研究、移风易俗等功能，而不仅仅是旅游场所；而高校与学术机构若能重拾书院的传统精神，走出中国教育和学术的创新之路，则受益者不仅是中国的教育和社会，也将为全球教育和研究的发展提供有特色、有积淀的中国经验。由此可见，对于书院价值的认同是探索教育改革中国道路的关键所在。

二、对书院文化价值的再认识

中国书院的诞生与成长，是中国教育及学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成果。自汉代“独尊儒术”开始，儒学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之主流。而几乎同时，印度佛教（当时的西学）传入中土，到隋唐时期已开始进入“中国化”的高潮；道教经东汉魏晋特别是玄学的发展，特别是唐代统治者的提倡，已足能与儒、释两家鼎立成三，并通过“三教合一”的努力在唐代以后建构了以儒、道、释并行互补的中国文化。至宋代，书院出现，在内容、形式、方法、原则等方面均

能融汇各家思想学说,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大融合。过去学界总认为,隋唐实行科举制,世人的思想均被束缚,且日益僵化。其实,从隋唐开始,在科举之外就有人才品评的多条路径,不入官学仍然可以应试为官。即书院开始,学者不以科考仕进为能事,而更关注真才实学与道德人格,在文化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适应了当时时代对文化多元互补的人才需求。

书院肇始于学界民间,先天即有自由、独立、务实和追求理想的基因,并有家国天下的担当,这对于中国文化生生不息、其命维新的特点而言是最适合不过的理想载体与教育方式。由于书院在办学、传道、教学、研究、践行等方面的多元化,也使得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继续保有包容、和谐、纳新、改革的特点,不仅能时时担起振兴儒家文化的责任,也使很多新的内容与形式,包括后来的实学、西学和诸多非主流的思想等,也都首先在书院试行。在儒家文化一直居统治地位的中国,官方的标准化教育利弊兼有,依据中国人的智慧,兴利除弊的最佳策略就是在体制外留有充分的非政府运作的空间。通过体制内外的同时探索实验,在官方风险降低的前提下,民间的多元探索能提供多方面的借鉴与参照,进而使社会的发展更加平稳和有序。可以说,这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文化内在发展的需要和必然规律,也体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发展自身文化方面的自觉意识和超凡智慧。由是观之,书院自呱呱坠地之日起,身上就承载了对中国主流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使命,其千年实践可谓不辱使命。

自宋至清,书院的多数依然坚持民间的和学术的立场,多数独立于科举之外。它们虽与官学不无联系,但因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相对独立,保证了其着眼点仍能真正以文化传承、自主学习和独立研究为本,成为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教育基地。清末外强入侵,击碎了中国人的自信和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自主判断。洋务派推进的书院改革也被“一刀切”、“一边倒”的“西学”导向所全盘抹杀。国人时时自警,不要“削足适履”、“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古训无人再去理会,对西方的崇拜甚至超过西人对上帝的崇拜。

时至今日,在最需要、最应当、最适合传承本土文化的大学校园里,很多人听到传统文化便嗤之以鼻,却会津津乐道国外在文化支流末节方面的标新立异。与之相吻合的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滑坡、文明的衰败、奴性的增强和创造力的萎缩。我们的教育不能很好地培养出具有文化内涵和传统精神的中国人,这应是当前最大的问题和最深层的危机。放眼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对传统文化真正有所了解的教师寥寥无几,人们对盲目的“全盘西化”似乎习以为常。即使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内容,亦经西学之肢解、筛选、归化,也早已“古意尽失”、“面目全非”。面对中西文化、多元文化融合互补的时代要求,中国最缺的是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知,因而更谈不上如何自觉、自立、自信和自强。在发展经济、科技、军事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复兴至为关键,而在其中与文化传统相应的教育或学习方式的复兴也极为重要,余英时先生曾痛惜道,目前中国学者“很少从内部对于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作出令人信服的新理解,新阐发”。“族群的自我认同尽管现在已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世界现象,中国知识分子恐怕未必能把握住这一契机。”“中国的文化危机今天仍在持续之中,甚至更为深化了。”^[7]在美国社会和高校一再强化其本土的历史和价值观的同时,我们的教育却在自毁文化传统,作为负责任的学界与教育界对此应该深刻反思。

三、当代书院复兴的可能性与前景

书院改制虽逾百年,但是书院实践活动却始终未停止。除了借鉴书院经验以“药今世教育之病”^[8]的湖南自修大学和清华国学研究院这一指向之外,书院实践活动还有另一指向——创建新的书院,复兴书院制度^[9](P662)。

书院的复兴有两次高潮:其一是在20世纪20—40年代,前期出现了一批虽不以“书院”为名,却行书院之实的教育机构,如1920年创办之无锡国学专修馆、1922年创办的秋浦周氏宏毅学舍、1928年创立的沈阳萃升书院等;后期伴随着新儒学的兴起,一大批传承传统文化的书院得以复建,如1934年创立的章氏国学讲习会、1938年马一浮创办的复性书院,1939年梁漱溟在重庆北碚创办的勉仁书院,1940年张君勱在云南大理创办的民族文化书院,1948年熊十力的弟子程兆熊在江西铅山创办的鹅湖书院,1950年钱穆等在香港创建的新亚书院。这批书院,以复性书院声名最大,新亚书院的生命力最强^{[9](P662)}。新亚书院初名亚洲文商学院,次年改为新亚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之时,其作为三大成员书院之一并入,发展至今,其运行模式也为今日大陆一些高校所效仿。其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始至今日,前期以1984年冯友兰、汤一介等在北京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为代表,历经30余年的实践仍在为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进程做着不懈努力;进入21世纪之后,古老的书院制开始焕发出更为蓬勃的生机:首先是书院制被部分高校纳入体系之中,继2005年复旦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书院之后,国内有几十所高校尝试和探索了书院制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10];2014年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知行书院发起的,由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大学共同成立的亚太高校书院联盟,正式将书院在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发展引入团队合作时代。其次是民间书院的兴起,构建了书院复兴的大环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由民间力量成立的现代书院已近500家^①。这些书院主要从事青少年和成人的国学教育研究,有的书院也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这些书院虽与教育系统中的书院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但是如此大规模的现代书院实体的涌现也反映出人们对于现代教育系统的不满和希冀。这些真实的事件都说明,书院在百年来的中国发展历史中,不仅没有被遗忘,还时常可以作为重要的参照与有待改善的现代教育制度相补充、相融合,并有利于突破僵化的体制和被禁锢的发展思路。同时,教育体系内外并行的书院精神的复苏也足以说明,书院的复兴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在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在西方的改革模式难以适应中国高等教育具体情况的尴尬之中,反观中国传统书院的经验,尝试进行书院式的探索,不仅有利于“守住中国文化的根”,也有利于找出破解改革困境的中国方式。特别在今天“全球化”、“国际化”、“一体化”、“标准化”浪潮之中,中国文化的振兴与发展已成为国民最重要的内在需求,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将成为改革深入推进的重要基础。或许,书院的复兴不是为了简单地接续“道统”,但在历史的积淀之上探索中国自己高等教育的发展之路,似乎已逐渐成为被广泛认同的奋斗目标。

作为世界文明“轴心时代”^{[11](P7)}的精神遗产,以中国儒学及佛道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在积极参与和建构着世界的现代文明,并在“对话”和交融的过程之中塑造了自己的本质特征,而书院的复兴将成为承载这一文明内核的重要载体、平台或途径。与中国文化结缘近50年的加拿大著名比较教育学者许美德,曾在《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一书中,对建基于独特而又有魅力的中国文明基础之上的,能与西方大学模式和谐共存的“中国大学模式”^{[12](P18)}提出过殷切的期待。虽然,在当下高等教育的世界版图中,谈“中国大学模式”为时尚早,但是随着对于书院研究的日益深入,对书院复兴的实践日益多元化,必定会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中国传统书院教育对现代大学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使教育界出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②之局面。应该指出,本文所论及的“书院复兴”绝非形式化、简单化的复古,也不是以一两所书院的成功经验做标本进行大规模的复制,梦想由此可获得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因为如此便会落入当下教育改革举步维艰的魔咒,跳不出陈旧的思路和僵化模式的怪圈。而从

① 参见 http://www.cflac.org.cn/ys./wx/zpyd/201307/t20130708_202648.html。

② 费孝通先生于1990年“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主题演讲时提出。

另一个角度看,以往成功的书院都必定要与时俱进,不仅在内容上有巨大的拓展,在技术、方法和
管理、评价等方面也能不断有因校制宜的改善。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教育之所以非常强调因地制
宜、法无定法,而不是制造一种包打天下的模式,就是因为已经意识到人是有差异的、学校是有差
异的、区域与专业也是有差异的。不变的是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而具体到学校和受教
育者,必然要做经验性和实用性的回归,方能使已经认识到的教育教学规律有效地指导相关的实
践。所以,所谓的书院复兴不应只是名义或形式上的复兴,而更应关注其精神和本土教育的认同与
借鉴,并应使中国的教育制度、社会学习制度、人才与学校的评价制度等更具针对性、包容性和开
放性,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再次进入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想之境。

从目前中国有关书院复兴的研究与实践探索来看,在观念上、制度上的转变还远远地落后于改
革实践,对体制内高校的过度依赖和对非正规、体制外有效探索的极度漠视,都将成为束缚书院复
兴的枷锁和障碍,也必然会阻碍中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正常发展。为此,还需要实事求是地进一步
解放思想,切切实实地通过学习传统、了解历史找回中国人、中国教育界的自信,并坚信中国的教
育改革与发展之路需要有中国传统的支撑,需要书院等中国方式的积极参与。

参考文献

- [1] 季蒙,谢冰.胡适论教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 [2] 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略[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5.
- [3]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 [4] 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
- [5] 李才栋.白鹿洞书院考略[J].江西教育学院学刊,1985,(S1).
- [6] 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中国书院研究文献索引[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 [7] 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M].上海:三联书店,2005.
- [8] 杨家骆.书院制之缘起及其优点[J].东方杂志,1940,(37).
- [9]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 [10] 张应强,方华梁.从生活空间到文化空间:现代大学书院制如何可能[J].高等教育研究,2016,(3).
- [11] [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12] 许美德.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孙 洁)

MAIN ABSTRACTS

Comparative Study on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between China and USA

HU De-sheng, WANG Tao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in the water function zone, one of three core factors in the Most Stringent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economy and ecosystem in China, and to people's health as well. To achieve the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goa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its effect between China and USA, and concludes that China could perfect its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n two aspects: (i) improving the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laws and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ii) strengthening long-term effective mechanism of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Impact of Subjective Achievement Mentality on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 An Empirical Research in Wuhan

LIN Zeng, WANG Xiao-lei

Residents' life satisfaction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social governance effect. To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can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social manag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n social conditions in Wuhan city, with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on related variables as control variables, personal ability, domestic capital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gether with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four corresponding results are obtained.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ree subjective achievement factors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among which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has the biggest influence, and domestic capital has the smallest influence.

Magnate Ranking List and Company's Earnings Management: Prestigious or Backfired?

YU Ming-gui, WAN Long-xiang

By utilizing the debut in "Forbes China Rich List" of actual controllers of companies as an exogenous even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company's earnings management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list announcement. Through studying existing literature on media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paper presents two competing hypotheses: through market pressures impact from the media, actual controllers on the list for the first time will enhance accrual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market supervision impact from the media, actual controllers on the list for the first time will reduce accrual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e paper show that after the actual controller of a company appears on the "Forbes China Rich List" for the first time, media coverage will bring pressure to the company. To ease the pressure, companies may choose to enhance their accru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short term. The result is more obvious for companies whose actual controllers have been on the List for several times.

Modern Value of Chinese Academies' Revival

CHEN Fang-ping, WANG Yan-fang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ducation, academies have lasted for one thousand years and played a huge role in many aspects. As times goes by, academies have gradually faded out, but the core elements of academies still exist and tend to revive in various forms,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people's attention to traditional culture elements, but also indicates their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ith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mind, 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rethink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academies.